

密疏与嘉靖皇帝理政方式的转变

(吉林大学 文学院历史系, 长春 130012)

王 剑

学界在论及明中叶以后诸帝时,多以怠政笼统概括,其表现无非是疏于与大臣论政,或怠于上朝,或懒于批答章奏。事实上,在中叶以后的诸帝中嘉靖皇帝并非完全如此。嘉靖皇帝不临朝或少临朝而能牢牢控制朝政,他“虽深居渊穆而威柄不移”;他修玄厌政却“大张弛、大封拜、大诛赏皆出独断,至不可测度”。这个结果和通常所说的嘉靖皇帝怠政的表现是不一致的。何以至此?嘉靖朝是明代使用密疏十分广泛的时期。它对嘉靖朝的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改变了嘉靖皇帝的理政方式。

早朝由勤于理朝到临御日浅

在明代,皇帝最主要的理政方式不外乎是上朝与朝臣们商议政务和处理批答章奏两种。

本来自明初始,皇帝与朝臣们议政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君臣同游”、“赐宴”、“留宿”、“入直奏对”等,但这些良好的议政传统大多没有得到很好地遵守,据徐学聚《国朝典汇》卷24《论道议政》和卷26《召对》条的记载,这些议政方式主要发生在明初,稍晚也大多在孝宗弘治以前,此后这些行之有效的议政方式则少有发生。因此嘉靖时的杨一清说:“至我宪庙以来,召对延访之典缺焉”。^①除以上各种议政方式外,皇帝最主要也是最经常的与朝臣商议政务的方式就是举行朝会了,即通常所说的上朝。

作为明代皇帝理政方式的上朝,只是日朝。明制规定,皇帝上朝分大朝和常朝两大类,大朝只在每年的正旦、冬至和皇帝的万寿节时举行,此时皇帝的主要活动是祭祀和接受百官的朝贺,并不处理政务,甚至宣宗在宣德二年规定:“今岁维新,上元届节,特赐百官假十日,凡有机务重事,封进来闻。”此制成为定例,为后来历代遵行,至有“诸司堂属,俱放假遨游,省署为空”之景象。^②而常朝中的朔、望两日,也是礼节性朝会,这两天“百官公服朝参,而不引见奏事”。^③

日朝是明代诸帝处理政务的最主要方式,它又有早朝和午朝之分。午朝本来是皇帝在早朝之后,与一些特殊的大臣继续商讨政务的方式,所谓:“蚤(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间不得尽所言,午后事简,卿等有所欲言,可就从容陈论,毋以将晡朕倦于听纳,盖朕有所欲言者,亦欲及此时与卿等高权。”^④但在英宗初年,因英宗年幼无议政能力,午朝之制遂被取消。此后午朝虽在景泰间得以恢

^① 杨一清:《杨一清集》密谕录,卷六,《论进广圣德以弭天变本奏对》。

^②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元夕放灯》。

^③ 《大明会典》卷四十三,礼部一,《朝贺》。

^④ 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〇九,《朝仪》

复，亦多是时辍时复，即便是有限的恢复，也多流于形式。到了嘉靖元年，山东道御史刘廷篔奏请世宗仿太宗午朝之制，“勤政事亲儒臣以慰天下仰望”，世宗嘉纳之，^①但并没有举行午朝之典。

从太祖到宣宗，早朝之制是得到严格遵守的，无论严冬还是酷暑。甚至在“冬气严凝，群臣早朝奏事，久立不堪”的情况下，早朝之制也没有停止过。^②很显然，此时的早朝既是皇帝们勤于政事的表现，也是他们实在地处理政务最有效的方式。明代早朝之制出现变化是缘于英宗冲龄即位后的一个偶然：“英宗以幼冲即位，三杨虑圣体易倦，因创权制，每日早朝，止许言事八件。”明人王铎、焦竑、朱国桢和孙承泽等人都记载过此事，^③不过焦竑在《玉堂丛语》中的记载值得注意：“自太祖相传，列圣临朝，每至日昃，不遑暇食，惟欲达四聪以来天下之言。英宗以幼冲即位，三杨虑圣体易倦，因创权制，每日早朝，止许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诣阁下，豫以各事处分陈上，遇奏，止依所陈传旨而已。英宗既殂，三臣继卒，无人敢复祖宗之旧者，迄今遂为定制。”^④焦竑所记是源于王铎的《寓圃杂记》。焦竑为万历时人，所记之“迄今”应是万历时期。言外之意，嘉靖时期也应是遵循这个传统。

毫无疑问，早朝处理章奏如此之少，早朝议政的功能已大打折扣，这使得皇帝上朝理政的效果和积极性受到影响，甚至早朝已成为一种礼制或皇权存在的象征。事实上，明中叶以降诸帝罕与大臣相见的情况，正好能说明这一点。这表明中叶以后诸帝的理政方式已发生了变化。不过，就嘉靖皇帝来说，情况并不完全如此。世宗皇帝对上朝理政的热情，却经历了由初政时的励精图治，到中期以后的疏于上朝。

世宗初政，尚勤于治。但是，自清人赵翼在《陔余丛考》中说有明中叶天子不见群臣以后，特别是“统计处成化到天启一百六七十年，其间延访大臣不宏（弘）治之末数年，其余皆廉远堂高，君门万里。无怪乎上下否隔，朝政日非”的说法，^⑤让后人多将自宪宗至天启间的皇帝笼统地等同视之，并将少上朝或不上朝视为怠政的标准。这种看法在除世宗之外的其他皇帝身上可能是这样的，但世宗却绝非如此。《明史》记载并为后世所诟的世宗最早的怠政是嘉靖三年。《邓继曾传》云“帝渐疏大臣，政率内决”。此记载并不足以说明世宗怠政不朝，因为嘉靖三年正是世宗和杨廷和等议礼大臣在继续和继嗣问题上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当时的世宗不可能去亲近这些在议礼问题上反对他的人。因此，赵翼就此评述的“是临政未久，即已疏大臣也”，是没有根据的。又有赵翼以嘉靖十一年正月的祈谷礼由郭勋代行之事，来推断世宗的怠政，其实也是没有根据的。理由是此前的实录中并没有世宗怠政不朝的记载。此事倒有两个反证。嘉靖六年十二月，大学士杨一清奏请世宗勿过劳：“今陛下常于味爽以前视朝，或设烛以登宝座，虽大风寒无间。是固励精图治之心，第圣躬得无过劳乎”。^⑥再即嘉靖十一年七月，因“上体违和，数不视朝”，鸿胪寺卿王道中因请领缴敕书及辞见人员暂受左顺门。当时的礼部尚书夏言说：“皇上励精图治，视朝临政，鲜有暇日，其面见面辞及领缴命敕人员，虽遇暂

^① 《明世宗实录》卷十九，嘉靖元年十月丁亥。

^② 余继登：《典故记闻》卷七，永乐七年十月

^③ 王铎：《寓圃杂记》卷一。焦竑：《玉堂丛语》卷六，《事例》。朱国桢：《大政记》。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四十九，《通政使司》。

^④ 焦竑：《玉堂丛语》卷六，《事例》。

^⑤ 赵翼：《陔余丛考》卷十八，《有明中叶天子不见群臣》

^⑥ 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〇九，《朝仪》。

时免朝，仍候视朝时奏见。”“上深然之”。^①因此世宗初政应是视朝不辍的。这一点，世宗本人也说过：“朕诞膺天眷，临御大宝，二十一年于兹，夙夜兢兢，钦若上帝，祇奉庙谟，罔敢怠遑。故凡八柄之操，五刑之用，皆稽谋自天，考训于祖，恩宥罔偏于近御，刑赏大同于宫府，凡以成平明之治，洽于变之风，以期无负天与祖宗付託之重”。^②

世宗开始少朝或不朝是在嘉靖二十一年宫婢之变后，此后他移居西苑少有上朝。史称：“遭宫婢变，移居西内，日求长生，郊庙不亲，朝讲尽废，君臣不接。”^③为此，有学者认为，“在嘉靖二十年之前，世宗是位勤于政事，致力于全面改革的有为之君”。^④言外之意也是说世宗在嘉靖二十一年以后，不再是热心于朝政了。事实上未必如此，世宗少朝或不朝只是表面现象，我认为，此后世宗的理政方式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即由过去的上朝理政向独揽批答章奏的转变。

由上朝理政向重视章奏批答的转变

在明代皇帝的理方式中，和上朝理政一样重要的还有批答章奏。它是朝廷“耳目外通”了解下情，防止“聪明内蔽”的重要方式，也是朝廷通过对章奏的批答来发布政令，进而施政的重要手段。历朝历代都很重视章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明初诸帝更是如此。朱元璋将否能掌控对朝臣章奏的独立批答，视为剥夺中书省权力并实现皇权专制的重要手段。^⑤所以在洪武十三年废除丞相制以后，天下章奏皆由他一个人亲批，所谓：“批答与御前传旨为一事”。但是自永乐年间内阁出现以后，皇帝对朝臣章奏的批答发生了一些潜在的变化，这就是永乐以后，皇帝对正常章奏的处理出现了程序上新变化。《翰林记》说“永乐、洪熙二朝，每召内阁造膝密议，人不得与闻，虽倚毗之意甚专，然批答出自御笔，未尝委之他人也。”^⑥洪武时期的所有章奏都是皇帝一人亲批，而永乐、洪熙时期则出现了皇帝与内阁阁臣共议的局面，虽然“批答出自御笔，未尝委之他人”，但批答之内容已经包含了皇帝与阁臣“造膝密议”的意见。这些出自御笔、未尝委之他人的批答，因永乐皇帝的英明刚武，可能更多的是永乐皇帝自己的主张，阁臣的意见还相对较少，但到了仁宣时期，阁臣的意见对皇帝决断的影响越来越大。宣德时期内阁出现了票拟制正是符合这样的政治要求。

从制度的设计上来说，内阁的票拟制本应是为了协助皇帝更好地处理章奏，但这个制度本身要求皇帝必须以勤政为前提，一旦这个前提得不到保证，那么，内阁的票拟则可能成为皇帝怠政、不认真处理章奏的一个支持条件。英宗以冲龄即位，“三杨”将早朝的朝仪改为日理章奏八件，这就使得皇帝在常朝之外处理章奏的事务应该明显地增多，如果英宗在长大后能象“三杨”所期望的那样，将此权宜之制改回“故事”的话，那么皇帝批答章奏事务的繁重性还可能有所减轻，或者皇帝减少处理章

^① 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〇九，《朝仪》。

^② 《明世宗实录》卷二六八，嘉靖二十一年十一月戊申。

^③ 《明史》卷二〇七，《陶仲文传》。

^④ 田澍：《嘉靖革新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68页。

^⑤ 如洪武三年底朱元璋对儒士严礼反对奏事隔越中书的坚决批驳，并再次重申“人君不能躬揽庶政，故大臣得以专权自恣。今创业之初，正当使下情通达于上，而犹欲塞之，可乎？”这无疑是对丞相专揽下情的不满。洪武十年六月颁诏臣民言事许直达御前；七月设通政司掌四方章奏；到十一年三月规定臣民奏事不许关白中书省。至此奏事不许隔越中书省的规定被打破了。

^⑥ 黄佐：《翰林记》卷二，《传旨条旨》。

奏所产生的副作用还可以通过上朝的方式得以补充。事实并非如此。“三杨”创立的权宜之制成为后世的定制后，皇帝能否及时地处理章奏也就成了皇帝理政最重要的途径了，如果这个途径得不到保证，皇帝的怠政将是实际地发生了。也正是因为明代中后期的皇帝在怠于上朝之后，又在处理章奏方面不能象太祖太宗那样勤政，所以为后人批评诟骂者较多。

而事实上，从明中叶以后，英宗和世宗两位皇帝在处理章奏方面并不象后人通常所说的那样。关于英宗，有学者说“在南城的日子大概使英宗懂得了敬天勤政的重要性。复位后，他对敬天敬祖、处理政务、接见大臣等事是一丝不苟地进行”。^①在章奏的批答方面，英宗曾对阁臣李贤说：“朕每得章奏，无不亲阅，左右或以为万几（机）至繁，一一亲览，未免劳神，恐非养生之道。朕谕之曰，身负荷天下之重，而图自安逸可乎？劳一身以安兆民，予所欲也。”^②英宗之所以在处理章奏方面如此勤政，除了南城之痛记忆犹新的激励外，英宗后期的内阁阁臣李贤、彭时和吕原等，多同心同德、协力相资，共同辅佐英宗皇帝。特别是李贤，史称“自三杨以来，得君无如贤者”^③，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在协助英宗处理朝政和章奏方面的作用较为突出。而此时英宗对司礼监宦官在处理章奏方面代为批红的依赖，还不是很特别。所以英宗在处理朝政和批答朝臣章奏方面，还是相当积极主动的。

从成化到正德间，诸帝大多是既懒于上朝理政，又疏于处理章奏。这除了几位皇帝个人懒散的因素外，此间体制的支持也发挥着不小的作用。一方面，这时内阁的阁臣很少有象“三杨”和李贤那样的能形成一个内阁整体，齐心协力，竭诚辅佐，而多是庸才充位型内阁和阉党型内阁，^④即便有刘健、谢迁、李东阳、王鏊、杨廷和等正直之能臣补救其间，仍不能改变几位皇帝的怠政情况，有时甚至正是这些能臣的竭诚辅佐，反而还使得这几位皇帝在处理朝臣章奏方面更多的依赖于内阁的票拟。另一方面，随着内阁体制在这个时期日渐定型，司礼监在代皇帝批红方面也渐成定制，特别是这个时期几位皇帝都比较重视和信任身边的宦官，如宪宗朝的汪直、孝宗朝的李广，武宗朝刘瑾等宦官，司礼监宦官在协助皇帝处理章奏方面的作用越发独立。虽然有的学者认为，“宦官批红则完全是代皇帝行事，只能表达皇帝的意见和决定，而不能掺杂自己的私意。换句话说，内阁票拟权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而宦官批红权则完完全全地隶属于皇权”。^⑤但实际上，这个说法恐非完全如此。此说的根据应是刘若愚在《酌中志》所说的：“凡每日奏文书，自御笔亲批数本外，皆众太监分批，遵照阁中票来字样，用朱笔楷书批之，间有偏旁偶讹者，亦不妨改正”。^⑥如果照此说，那么司礼监的宦官在代皇帝批红时就应该是不时地要向皇帝询问如何批红，而实际的处理程序并非如此，一是根本没有司礼监宦官在皇帝身边代为批红的记载，二是刘若愚说：“凡每日票本奏下，各秉笔分到直房，即管文书者，打发本管公公，一本一本照阁中原票，用朱笔誊批，事毕奏过才打发。”^⑦言外之意已明确，宦官们代批红是在自己的值房，而不是在皇帝身边，所以司礼监宦官批红完全是代皇帝行事的说法，是不完全准确的。但无论是皇帝批答章奏时对内阁票拟的信赖，还是司礼监代皇帝批红的越发独立，都会在体

^①赵毅、罗东阳：《正统皇帝大传》，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327页。

^②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一〇，《章奏》

^③《明史》卷一七六，《李贤传》

^④暴鸿昌：《暴鸿昌文集》，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12页。

^⑤张显清、林金树：《明代政治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18页。

^⑥刘若愚：《酌中志》卷一六，《内府街门职掌》。

^⑦刘若愚：《酌中志》卷一二，《各家经管纪略》。

制上让皇帝更加怠政，宪宗、孝宗和武宗莫不如此。

世宗皇帝则截然相反，如前述，世宗初政尚勤于治，视朝不辍。问题是三杨创立的权宜之制以后，特别是宪宗成化朝以后，皇帝的视朝已成“具文”，皇帝的理政方式很显然主要依赖于对朝臣章奏的批答。在嘉靖二十年以前，世宗在勤于视朝的同时，已特别重视对朝臣章奏的批答。二十一年“宫婢之变”以后，他虽移居西苑，不再上朝，也很少接见群臣，不与群臣议政，但他却通过批答朝臣章奏的方式，控制着朝政，总揽天下。范守己说：“臣于徐少师阶处，盖捧读世庙谕札及改定旨草，云人尝谓辅臣拟旨，几于擅国柄，乃大不然。见其所拟，帝一一省览窜定，有不留数字者。虽全当帝心，亦必更易数字示明断；有不符意，则驳使再拟，再不符意，则谯让随之矣。故阁臣无不惴惴惧者。……以故大张弛，大封拜，大诛赏，皆出独断，至不可测度。辅臣欲有所与，亦从臾之，或揣摩捭阖之耳。”^①所以明人对世宗理政方式转变的认识是很清楚的。李维桢说：“（世宗）斋居数十年，图迴天下于掌上。中外俨然如临”。^②何乔远说：“（世宗）晚节西苑崇玄，帝心固以为敬天，虽万几在宥，而精神无时不运于天下，四十余年如一日。”^③明人的这些说法表明，世宗皇帝并没有怠政，他虽少上朝或不上朝，不与朝臣议政，但他勤于批答章奏，因而才能做到“晚年虽不御殿而批决顾问，日无停晷，虽深居渊默，而张弛操纵，威柄不移”。^④因此，世宗皇帝的理政风格，既不同明初的太祖、太宗勤于视朝议政，也不同于中叶以后其他的帝王既疏于视朝，又懒于批答章奏，而是在表面上疏于上朝，实际上，通过每日勤于批答章奏进而达到乾刚独断的局面。

由批答章奏向更加重视密疏的转变

在明代，密疏也称为密奏、密陈、封事、密疏言事等。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秘密章奏，是一种下情上达的特殊方式。^⑤明代诸帝对密疏政治，可以说是情有独钟。如太祖用其来剥夺相权，或打击功臣以加强皇权；建文帝用其作为与朱棣进行斗争的秘密武器，^⑥永乐以后诸帝基本上都将其作为了解下情的重要渠道。更重要的是，自洪武年间始，密疏政治还逐渐地制度化了，在诸如密疏的书写与进呈、处理程式、进密疏人的资格、保密等各方面，均形成了一整套约定俗成的规章与制度，这对明代中后期的诸帝实行密疏政治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和先例。

在明代的现实政治中，中叶以后的诸帝，尤其是被后人视为怠政的皇帝，无一不对密疏政治表现出强烈的依赖，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叶以后的诸帝由于怠政而造成了君臣否隔，言路不畅，而密疏政治却可以弥补由于疏于视朝或懒于批答章奏而引起的皇权对朝政可能的失控。万历时的马孟祯在批评万历皇帝时曾道出过其中的缘由：“二十年来，郊庙、朝讲、召对、面议俱废，通下情者惟章奏。而

^① 谈迁：《国榷》卷六四，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辛丑，“范守己曰”

^② 谈迁：《国榷》卷六四，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辛丑，“李维桢曰”

^③ 谈迁：《国榷》卷六四，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辛丑，“何乔远曰”

^④ 谈迁：《国榷》卷六四，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辛丑，“史臣曰”

^⑤ 王剑：《明代的密疏：下情上达的一种特殊方式》《西南师大学报》，2005年第2期。

^⑥ 焦竑：《玉堂丛语》卷四，《忠节》；《明史》卷一四三，《王良传》记载：永乐初年，太宗曾让翰林侍读学士解缙、胡广、李贯等整理建文时群臣章奏，“出建文时群臣封事千余通”，太宗遂“命（李）贯与（解）缙等编阅，留军马田粮数，尽焚诸干犯者。因从容问贯、缙等曰：‘尔等宜皆有之。’众未对，贯独顿首曰：‘臣贯实未尝有也。’建文朝仅短短几年，有这么多密疏，说明建文朝密疏政治大行其道。

疏入旨出悉由內侍，其御覽與果出聖意否，不得而知，此朝政可慮也。”^①馬孟禎所言雖然是直指萬曆皇帝，但馬氏所批評萬曆的這幾項毛病，帶有一定的普遍性，在明中葉的諸位皇帝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也就是說，萬曆朝“通下情者惟章奏”的理政特點，在前朝怠政諸帝身上一併存在。不過，我們發現，怠政諸帝沒有一個失去對朝政的控制的。據此，清人趙翼也不解地說：“倦勤者即權歸於奄寺嬖幸，獨斷者又為一二權奸竊顏色為威福，而上不知主德如此，何以尚能延此百六七十一年之天下而不遽失，誠不可解也。”^②其實，趙翼所不解的問題的結症是，緣何明代中葉天子不見朝臣，君臣否隔，明朝還能苟延殘喘一百多年？問題的答案趙翼曾提及過，但沒有引起他足夠的重視，這就是他引馬孟禎奏言時提到的“通下情者惟章奏”這句話。據此，我認為，“通下情者惟章奏”，亦即諸帝不見朝臣卻可以通過批答章奏完全控制朝政的另一說法。這表明唯重章奏已經是中葉以後諸帝的一種理政風格，同時這種理政風格又為密疏政治的存在提供了良好的環境。因為如前所述，密疏的本質特徵就是一種特殊的章奏。

與明中葉其他諸帝相比，世宗在重視和使用密疏方面可以說是個典範。與一般的章奏相比，密疏因其上呈渠道特殊、保密效果好、處理程序簡便、無需內閣票擬、可以避開六科發抄等特徵，可以完整地體現皇權在決策方面的獨斷性、獨立性和絕對性。^③這是行密疏政治最好的體制保證，也是下情上達最有效的方式，又舍此而誰？此外，世宗大行密疏政治，還與嘉靖初年的政治現實有着密切的關係。世宗以宗藩身份入主大寶，初始有楊廷和等大臣因大禮議與他分庭抗禮，很難形成融洽的君臣關係，張璁、桂萼等議禮大臣受到世宗重用以後，很快又形成了親如魚水的君臣關係，這無疑是十分有利於密疏政治實施的。而在嘉靖一朝中，朝臣給世宗進密疏的主要集中在楊一清內閣以後，楊廷和內閣中很少有給世宗進呈密疏的，這本身就說明了問題。

世宗皇帝重視密疏主要有以下幾個表現。其一，世宗給朝臣賜印許密疏言事者很多，超過明代的其他皇帝。明代給朝臣賜印，許密疏言事的先例是由仁宗開啟的，此後遂形成傳統，為以後諸帝所遵循。僅據筆者所見資料的不完全統計，到嘉靖末年以前，明代給朝臣賜印許密疏言事者，總共有 35 人，其中嘉靖一朝就 16 人，幾占總數的一半，而洪熙、宣德、景泰和成化四朝才 19 人。^④在嘉靖朝被賜印許密疏言事的官員中有，楊一清、張璁、桂萼、李時、費宏、夏言、顧鼎臣、翟奎、方獻夫、嚴嵩、郭勛、仇鸞、邵元節、陶仲文、張佐和麥福等，其中閣臣占大多數的朝臣有 12 人，而邵元節和陶仲文當屬助世宗皇帝齋醮的佞幸，張佐和麥福是宦官，這些人都和世宗曾保持過密切的關係。世宗在頒給朝臣的《賜銀章敕》中說：“朕思朝廷政事，體類甚多，其有緊關重事，必須謀及左右信臣，以匡不逮。今除軍國重務文移，朕與卿等共理外，或有封對文書，必須驗封識以防出入。今以銀圖書二枚，凡有講學政事問于卿者，以‘耆德忠正’印封；若或朝政有差，忠言未納，用舍倒置，諸凡利于小民，關於朕德及政事之缺者，以‘繩愆糾違’印封，皆以密疏來聞，庶得征驗其真，亦朕免于過差矣。卿其欽乎。嘉靖六年十月十五日。”^⑤賜張璁、桂萼等其他人的敕，除了在所頒印信內容上小

^① 《明史》卷二三〇，《馬孟禎傳》。

^② 趙翼：《陔余叢考》卷一八，《有明中葉天子不見群臣》。

^③ 王劍：《密疏的非常制參與與明代的皇權決策》，《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7 年第 3 期。

^④ 王劍：《明代密疏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年，第 192 頁。

^⑤ 楊一清：《楊一清集》，《宸翰錄》卷首。

有差别外，其他内容多大同小异。从该敕中可以看出，实际上世宗要求被赐印信的朝臣应该密疏言事的范围十分广泛，可以说是事无巨细，无所不包。尤其应该注意的是，邵元节、陶仲文两佞幸，和张佐、麦福两宦官也被赐印许密疏言事，虽然他们被赐印多是为了在助世宗斋醮时更加便捷，但至少表明了他们在当时的特殊地位和特殊需要。

其二，朝臣多积极地给世宗进密疏，使得密疏成为许多朝臣言事议政的重要途径。世宗给诸朝臣赐印以后，被赐印者无不积极给世宗上密疏，甚至有被赐印者在进密疏方面态度马虎者，还受到世宗皇帝的严厉批评，如夏言。夏言因“所上密疏章奏，时有洗改文字，或忘加钦赐银印”，被世宗皇帝痛责，进而要求“既不遵奉，原赐印记并历年御帖，可即进缴。”^①但赐印只是给这些朝臣进密疏的一种特别荣宠，它不是对其他没有被赐印者进密疏的限制，在明代，没有被赐印者给皇帝进密疏者累朝皆有，嘉靖朝也一样，比如席书、张延龄、杨继盛、参议顾可学、赵文华、赵文华子赵恽思、徐阶等，这些人也多是世宗特别荣宠的人，他们也都经常地给世宗皇帝进密疏。以杨一清和徐阶为例，在杨一清和徐阶的文集里保留了大量密疏及世宗的批答。杨一清给世宗的密疏主要集中在嘉靖六年九月至九年九月间，^②徐阶文集中收录的密疏最早是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十七日的《请还大内并召见大臣计议边事》，最后一通密疏是嘉靖四十五年十月三十日的《论将军缙贵请继》，^③而此后世宗一直是处于病危的昏迷状态，根本已无法再批阅密疏，直至十二月十四日驾崩。杨一清和徐阶，一个是被赐印许密疏言事者，一个不是；一个在嘉靖初年，一个处于嘉靖末年，他们在为政中，密疏成为他们与世宗皇帝议政言事的最主要方式。

其三，世宗对朝臣密疏的批答更加重视、及时。嘉靖初年，世宗皇帝精力旺盛，既要与臣下论学，又要继续他的议礼活动，还有许多日常繁杂的政务要处理。此间各项重大政事，他都要以密谕的形式向亲信大臣进行垂询，而大臣们也都会就此进密疏，表达自己的意见。密谕和密疏一时成为嘉靖君臣讨论国事的最主要方式。世宗皇帝朝臣所上密疏的批答都是十分及时的，有当日批答者，更多的是第二天批出者，但很少有第三天或更长时间批答的。以批答杨一清的密疏为例，有当日批答者，如嘉靖六年，世宗因礼部尚书桂萼请禁约尼僧，毁其寺院，欲禁毁京师皇姑寺，但杨一清考虑到孝宗皇后张氏及世宗母后不毁皇姑寺的建议，因而上密疏《论存留皇姑寺奏对》，提醒世宗要“曲体两宫之意”，并建议世宗将皇姑寺存留。世宗皇帝接到杨一清的密疏后，即刻批答，“今早得卿密疏告朕，切见爱朕至意……”。世宗的批答中所说“今早得卿密疏”，说明了世宗对密疏批答是十分及时的，至迟不会晚于当晚。再如，嘉靖七年初，杨一清见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李承勋的朝班位次在阁臣张璁、桂萼之前，遂上密疏《论崇礼大臣本》，建议世宗将张璁、桂萼二臣“量加散官职衔，使与李承勋相等”。世宗也是当即批答，“只才午间得卿一疏，足见辅导至切。……”^④世宗的批答说明，杨一清的密疏是午间送至御前，下午皇帝就作了批答。

在世宗对密疏的批答中，第二天批出前一天密疏的占绝大多数。第二天即对密疏作出批答，应该

^① 王世贞：《弇州史料后集》卷五五，《罢辅臣敕》

^② 参见杨一清：《杨一清集·密谕录》。《密谕录》共7卷，收录的一清所上密疏共102篇，其中还包括世宗皇帝对每篇密疏的批答。

^③ 分别参见徐阶：《世经堂集》卷二，奏对二，及卷三，奏对三。

^④ 杨一清：《杨一清集》密谕录，卷五，政谕上，《论崇礼大臣本》

说是十分及时的，体现了皇帝对密疏要比正常章奏重视得多。当然，如果再考虑密疏的转呈时间、世宗的健康因素以及皇帝除去日常起居外还有其他事宜需要处理等因素，恐怕这种批答速度，是一般章奏不能启及的。

结 论

自清人赵翼在《陔余丛考》和近人陈登原先生在《国史旧闻》中得出明代中叶君主多怠政之说以后，现当代的学人都将此说奉为圭臬，在言及中叶诸帝为政作风时，多一概而论。总得来说，自成化以来，中叶诸帝确实不如太祖、太宗，甚至是英宗那样勤政，但将几位皇帝等而视之，也很显然是有失公允。就世宗来说，嘉靖初年，他致力于大礼议，完成了他想要达到的每一个议礼的要求，同时他还和阁臣一起刷新了明中叶以来的诸多弊政，嘉靖二十一年以后，他虽长期修玄于西苑，好象远离了对朝政的控制，实际上，无论他是前期的励精图治，还是后期专心于修玄，他一刻也没有放弃对朝政的绝对控制。正所谓后人所说的“虽深居渊穆而威柄不移”；^①虽修玄厌政而“大张弛、大封拜、大诛赏皆出独断，至不可测度”。

何以能至此？窃以为，就是世宗皇帝的理政风格与其他诸帝迥异而已。他的理政方式经历了三个变化，即，由勤于早朝理政到临御日浅；由上朝理政向重视章奏批答的转变；由批答章奏向更加重视密疏的转变。此三变，在形式和表面上，是一个比一个隐蔽，一个比一个看起来好象是疏于理政，（由于密疏有高度保密的特征，除了皇帝和上密疏者外，其他人是不可能得知君臣之间有密疏政治之事，因而密疏政治的隐蔽性是非常突出的）事实上，恰恰相反，世宗皇帝就是在越来越“怠政”的表象下，通过密疏政治越来越严密地现实了对朝政的控制。也正是这些越来越“怠政”的表象，成为后人认为世宗皇帝也是一个怠政之君的主要原因。

不过，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世宗皇帝理政方式的每一个转变并不都是以时间先后为序的。从勤于早朝到临御日浅，从上朝理政向重视章奏批答，在时间上基本是可以承接的，大约是以嘉靖二十一年的宫婢之变为界线，但也并非是十分的严格，因为自日理章奏八件成为传统以后，上朝理政往往流于形式，对朝臣章奏的批答则成为更主要的理政方式，而自嘉靖二十一年宫婢之变以后，世宗皇帝不再上朝，因而，世宗皇帝的理政方式完全转向了对批答章奏的依赖。而世宗皇帝由批答章奏向更加重视密疏的转变，则完全是贯穿嘉靖一朝绝大多数时间的。这主要是因为，在本质上，密疏也是一种章奏，只不过它的地位较为特殊，作用更加突出罢了。从嘉靖初年世宗赐银印给部分朝臣许他们密疏言事始，密疏就一直是世宗皇帝掌控朝政最主要的方式，这在时间上和世宗勤于上朝，再由勤于上朝到重视对章奏的批答的转变并不矛盾，这也正说明了密疏在嘉靖朝独特的地位。

^① 《明世宗实录》卷五六六，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辛丑。
會議論文 請勿轉引